

梵二後的山西天主教禮儀初探 (1979-2017) —— 以山西太原教 區的禮儀及聖樂為例

段春生

摘要：本文研究梵二後的山西天主教會，主要以全省具有代表性的太原教區作為集中考察對象，利用歷史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山西天主教進行田野考察，從「梵二」的視野審視山西教會從1979到2018年近四十年的發展。首先，研究山西教會從拉丁彌撒禮儀到中文彌撒禮儀的改革；再者，梳理教會聖樂在山西的演變，以及教會在聖樂本地化方面的探索及歷史反思；最後試圖通過對山西地方教會的考察，以窺探整個中國教會近四十年來的禮儀及聖樂的變化和發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hanxi after Vatican II. The study concentrated on investigating the Taiyuan diocese, which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iocese in the whole nation. Using historical,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 field inspection of the Shanxi Catholic community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in Shanxi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from 1979 to 2018, under the light of Vatican II. Firstly,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e from the Latin Mass order to the local Chinese Mass order. Then, the article goes 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acred music in Shanxi, and also the Church's standpoin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sacred music, its exploration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Finally,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ocal churches in Shanxi province,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urgy and sacred music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within the entire Church in China.

一、前言

1. 研究緣起

1962-1965年間，在梵蒂岡召開的天主教第二十一屆大公會議是近現代天主教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梵二之父——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開幕致辭中強烈呼籲要「更新教會 (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並以「牧靈」作為會議的主要議題，在牧靈方面主要以禮儀作為整個大公會議的切入點。¹

梵二閉幕迄今已有五十三年，其對普世教會的影響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對中國大陸教會而言究竟產生過那些影響呢？中國教會自五十年代起經歷了多次運動的震盪與衝擊，處於閉塞狀態，直至1979年改革開放，始逐步了解到普世教會發展的動態。而作為內陸地區的山西教會，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真正接受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

首先，山西各教區的主教積極奔走呼籲，於1985年恢復了山西修院，為山西教會培養了數以百計的青年神職人員，這些年輕的神職人員不僅有效地緩解了教會青黃不接的問題，而

1 Giuseppe Alberigo, *Breve storia del concilio Vaticano II* (Bologna: Il Mulino, 2005), pp. 15-17; 陳文裕, 《大公會議簡史》(台北: 上智出版室, 1989), 頁81-83、217; 胡斯托·岡薩雷斯 (Justo L. González) 著, 趙城藝譯, 《基督教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下卷 (上海三聯書店, 2016), 頁442-444。拉辛格, 《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香港: 良友之聲出版社, 2018), 頁18-19。

且給教會的發展帶來活力。^{2 3}

對山西教會影響大的莫過於教會禮儀生活的改革，因為彌撒禮儀、祈禱日課、聖事禮典的全面更新，給本地教會帶出一個嶄新的面貌。以往在望彌撒或聽彌撒時的朦朧不懂的經文，因為使用本民族語言，使得教友們明白了幾百年來祖祖輩輩們都不懂的經文意義，也有過去的「望」與「看」的角色，轉變為「參與」彌撒。彌撒禮儀的改革給教友生活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經驗。

要了解山西天主教近三十年來（1985-2015）的發展動態，探究何以呈現出如此蓬勃的生機的原因，就需要回溯天主教在山西近400年的發展歷史，梳理明清耶穌會與方濟會傳教士從建立山西教會，到對本地教會進行持續的信仰培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山西天主教傳統。

山西天主教禮儀改革運動首先發自修院，1989年9月初山西修院舉行了第一台中文彌撒禮儀。

2. 山西天主教歷史一瞥

早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傳入中國的景教，曾獲得一定的發

2 1985年4月1日，山西教會借太原教區圪遼溝堂區南院正式開學，有來自全省八個教區43位修生，1990年7月，第一屆48位畢業晉鐸；1991年7月，修院招收了第二屆40位修生，於1996年7月，有37位畢業晉鐸。此後，1993年9月，又招收了第三屆20位修生，1996年9月，第四屆招收34名修生。至2013年修院關閉，山西修院前後位教會培育了近200位神職人員。

3 山西教會孕育的聖召，在山西修院接受培育的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的服務於外省教區的神職人員，均由其歸屬教區安排在不同修院接受培育。據統計，自開放三十多年來，山西天主教孕育了約有800多位神父，成為中國聖召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有360多位神父服務於本省教會，另外約超過400多位司鐸服務於外省教區。

展，但因唐武宗皇帝（814-846）排佛一度消沉。⁴1294年，方濟會士孟高維諾進入中國，在北京和福建一帶建立傳教區，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在華夏生根發展。⁵

1620年，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S.J., 1582-1649）應邀赴山西絳州開教；1624年底，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S.J., 1566-1640）被派至絳州傳教，至1649年4月9日去世，高一志在韓霖與段衮兩大家族鼎力支持下，於15年多的時間，為山西留下了8000多教友，102座教堂與祈禱所。在高一志及其同伴的努力下，天主教在山西成功得以生根和發展。⁶

1692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初設北京和南京兩個教區，山西屬北京教區統轄；1696年，在中國改設9個代牧教區，山西即其中之一。至1716年，耶穌會因疲於應對禮儀之爭，乃委託方濟各會代管山西教務。同年，羅馬教廷將山西和陝西兩省合併稱為秦晉代牧區，直至1844年。1844年，根據教會發展需要，秦晉代牧區劃分為陝西、山西兩個代牧區，義大利方濟各會士杜約理（Gabriele Grigolio, 1813-1862）為山西代牧區首任主教。鴉片戰爭後，由於教會擁有了相對自由的傳教環境，教務發展

4 在山西西北部大同一帶有意景發展的痕跡。見沙百里著，耿昇譯，古偉瀛、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徒史》（台灣：光啟出版社，2013），頁19-22；賴德烈著，雷立伯、靜也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頁44-47；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頁41-46。

5 賴德烈，《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頁59-61；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頁95-100。

6 A. Chiotti & L. Pfister, *Nella scia di un Grande: Sei illustri missionari Gesuiti Italiani nella Cina del XVI e XVII secolo* (Taichung, Taiwan: Chungtai press, 1991), pp. 26-35；黃一農，《兩頭蛇：中國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興盛。1890年山西代牧區劃分為南、北兩個代牧區。⁷

1949年前，山西天主教教務興盛，先後分為八個代牧區與監牧區：太原代牧區(1696)、榆次監牧區(1931)、汾陽代牧區(1926)、朔州監牧區(1926)、大同監牧區(1923)、洪洞代牧區(1932)、潞安代牧區(1890)和絳州監牧區(1936)。1946年中國天主教成立聖統制後，原先的代牧區和監牧區統均升格為教區。⁸

1949年後，山西天主教歷經多次運動的震盪與衝擊，致使教會生活損失慘重。文革結束後，教會的信仰生活逐步得以恢復。1982年山西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參照國家行政區劃分，將原有八個教區劃增至十個教區，教區的名稱和邊界也做了相應的調整。由於，中梵尚未正式建交，直至2008年梵蒂岡出版的《宗座年鑑》中，仍保留了1949年前教區舊的劃分機制。⁹

二、山西天主教彌撒禮儀改革

1. 教會禮儀

在早期教會根據基督的命令常舉行彌撒（感恩祭）禮儀，藉祈禱、擘餅，領受主的聖體，以紀念主的死亡與復

7 Sergio Ticozzi,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ve Catholic Clergy in China*, (Hong Kong: Holy Spirit Study Center, 2017), p. 103; 宋建勳,《山西天主教史》(山西:太原教區,2004),頁21-74;劉安榮,《中國化視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頁17-19。

8 十個教區的名稱從北向南分別是:大同教區、朔州教區、忻州教區、太原教區、晉中教區、呂梁教區、臨汾教區、長治教區、晉城教區和運城教區。

9 參閱《宗座年鑑》*The Annuario Pontificio*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8)。

活。¹⁰但這一時期，教會並無統一的禮儀規範。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頒佈《米蘭詔書》後，尤其是380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 (Theodosius I, 347-395) 將教會欽定為國教之後，教會的禮儀生活始獲得了全面的發展。至6世紀，教會將禮儀祈禱文編纂成《聖事經本》(Sacramentarium)，並逐步完成禮儀的統一，7世紀形成的《羅馬禮規》即為今日彌撒經書之母本。¹¹

16世紀中葉，教會為回應新教改革並推動教會內部的改革與復興，召開了特倫多大公會議，會議之後，教會為回應和踐行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改革法令，先後頒佈了《羅馬教理書》(1566)、《羅馬日課經》(1568)、《羅馬彌撒經書》(1570)，以及《拉丁通行本》(Vulgata) 修訂本聖經 (1590)。¹²這些教會禮儀典籍，對此後300多年的天主教禮儀生活產生了鉅大的影響。

1620年代，當艾儒略與高一志等傳教士將天主教傳入山西絳州時，¹³教會正處於特倫多大公會議後天主教復興運動時期 (1540-1770)，¹⁴他們把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教會觀傳入中國，該屆大公會議竭力強調拉丁禮儀，對山西教會近400年的發展影響至深且鉅。

10 畢爾麥爾等編著，雷立柏譯，《古代教會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77。

11 孫晨齋，《天音北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頁24-25。

12 畢爾麥爾等著，雷立柏譯，《近代教會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頁84-85。

13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頁289。

14 夏伯嘉著，余芳珍譯，《天主教世界的復興運動，1540-1770》(*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i-vii。

在山西的耶穌會與方濟會傳教士謹遵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教導，在「行聖事、獻聖祭」時，均用拉丁語舉行。¹⁵由於教友們不懂拉丁語，只能以「望彌撒」或「聽彌撒」的形式分沾彌撒禮儀的神恩。當神父舉行彌撒禮儀時，教友們誦唸玫瑰經及其他經文，直到成聖體前打鈴聲，才停止公共祈禱，開始虔誠朝拜聖體。數百年間，教友們不懂神父喃喃低聲唸的拉丁語成聖體經文，只知道這是關乎整個禮儀最神聖的時刻，語言上的隔膜難明，似乎並沒有減少教友在整個崇拜禮儀中對天主所表達的神聖、愛慕和敬畏之情。

拉丁彌撒禮儀特別注重基督從最後晚餐的自我交付到十字架上自我祭獻，聖祭禮儀在拉丁彌撒禮儀中的主導地位被加強。教友們因無法明白聖道禮儀經文的含義，只有透過對聖祭禮儀行動的瞻仰，對基督聖體的頂禮膜拜，及長時間的虔誠祈禱，以達致對天主的敬畏和孝愛之情。在數百年的信仰生活中，山西教友在傳統的拉丁禮儀中獲得了信仰的滋養與基督徒生活的成長和堅固。

1723年雍正發動教難，直至兩次鴉片戰爭，大小教難彷彿洶湧的海浪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歷經長達100多年的教難的跌宕與震盪，拉丁彌撒也成為教友信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

2. 彌撒禮儀改革的風潮

眾所周知，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山西教會神職人員身陷囹圄，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逐漸陸續獲得了自由，重

¹⁵ 「除了望彌撒外，要勉勵做些慈善事，及熱心的神工，如望聖體降福、聽道理、講解問答、學習經文等。」《要理問答》卷二。

返教會工作。剛出獄的神父們約有20年沒有接觸拉丁語，他們找到了倖存下來的拉丁文《彌撒經書》，短期練習後，遂開始為教友們舉行彌撒。

據上海教區金魯賢主教在2011年的聖誕節牧函《梵二大公會議五十年》回憶，八十年代初期，金主教邀請香港羅國輝神父到上海教區講授梵二禮儀，並於1989年9月8日在佘山修院由陳日君神父主禮、羅國輝神父共祭，舉行了首台中文彌撒，深得修院師生的歡迎。此後，金主教採用了台灣翻譯的《彌撒經書》，對某些字詞做了微調以適應大陸人的閱讀習慣，並在國內外教會友人的鼎力協助下印刷了30萬冊經書，分送給全國各地教會，羅國輝神父代表香港教會又印刷了30萬冊支持內地教會的禮儀改革。之後，金主教又主持印刷了為神父們誦念的中文版《大日課》、《禮儀手冊》，以及修女們誦念的《日課》，以推動內地教會禮儀的全面改革。¹⁶

此外，隨著八十年中期「兩岸三通」政策的實施，僑居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神父們回內地探親時也把中文《彌撒經書》、神父們唸的《誦讀日課》及修女們唸的《日課》帶回家鄉教會，以支持本地教會的禮儀改革。同時，也幫助建教堂、開辦教會醫院、診所，作為福傳的窗口。

內地主教、神父們深深地被梵二改革精神所呈現出的新氣象、新面貌所感染，為回應大公會議的號召，並盡快恢復教友們的信仰生活，各教區神長們陸續開始使用中文《彌撒經書》和中文《大日課》。這場轟轟烈烈的禮儀改革運動，首先在各省教區間蓬勃展開，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之勢，促使北京

¹⁶ 金魯賢，〈梵二大公會議五十年〉，《神學論文集》，177期（台灣：光啟出版社，2012），頁77-78。

教區進行中文彌撒禮儀改革，北京教區是最後一個改用中文彌撒禮儀的地方教會。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北京教區獲得梵二大公會議的訊息較晚的緣故，乃是與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

譬如，據一位朋友講，梵二禮儀改革在全國各地教會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卻在武漢教區遭遇到了阻力，受阻的原因不是來自教會內部，而是來自當地宗教局和統戰部。當董光清主教向當局請示要響應梵二精神用中文舉行彌撒時，當局回答：「既然梵蒂岡說了要改彌撒禮儀，那我們就不改，我們繼續用拉丁語舉行彌撒」。

其實，中國教會在推進彌撒禮儀改革時遇到的阻力與其說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倒不如說來自教會內部的保守勢力的反對。山西各教區用了大約五到十年的時間來推動中文彌撒禮儀的改革，而各教區在禮儀改革的深度和廣度方面的進展又取決於地方教會的信仰傳統。通常傳統愈根深蒂固，改革時遇到的阻力也就愈大。

譬如，太原教區在推行中文彌撒禮儀時，既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其主要原因，是基於地方教會缺乏對梵二精神深刻的認識，也缺少舉行必要的信仰講解，讓教友們從心裡有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由此導致一些教友對突如其來的禮儀改革茫然不解，但表示服從教會的安排；另一些教友則堅持認為拉丁彌撒是教會神聖不可更改的傳統，是屬於基督信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有些老年教友振振有詞：「如果連做彌撒的語言都可以改的話，還有什麼不可以改呢？」他們難於接受神父舉行彌撒時，教友們可以站著、或坐著聆聽天主聖言，也無法接受神父面向教友們做彌撒，認為這些都是不可

思議的事情；更有些教友甚至有一段時間不進教堂，拒絕參與中文彌撒禮儀。中文彌撒禮儀改革的情形在山西各教區情況各異，但大都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磨合與適應，才逐步接受了禮儀改革這一基本的事實。

曾在山西修院教學現已過世的秦志遠神父有一次和教友談心，即反映了教會在當時彌撒改革時所面臨的重重阻力。當教友問為什麼要改彌撒禮儀時，秦神父就給他唸了一段拉丁文彌撒，問他明白嗎，那教友回答說不明白。秦神父又用中文唸了同樣意思的經文，問那教友明白嗎，那教友回答說明白。秦神父又問那教友：「拉丁文彌撒和中文彌撒那個好呢？」那教友回答：「還是拉丁文好，因為雖然不懂拉丁文的意思，但聽起來卻感覺舒服。」這樣的教友不在少數，他們之所以不接受彌撒禮儀改革，是因為對拉丁彌撒擁有很深的感情。為什麼教友們對拉丁彌撒禮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拉丁彌撒是教會不可更改的傳統嗎？抑或是因為中文彌撒本身使他們明白了彌撒的意義，因而缺少了彌撒固有神聖性和神秘性，而令他們無法接受彌撒禮儀的改革呢？這是一個頗為值得深思的神學禮儀問題。

山西教會接受中文彌撒禮儀改革困難重重的歷史事實，不期然地反映在教宗比約五世於1570年7月14日頒佈《羅馬彌撒經書》(Missale Romanum) 時對教會的諄諄教導：對彌撒經典「不許有任何人改變，即不可盜印，或加添一些經文，除了拉丁文外其他語言都不可用」。這句話奠定了四百多年來彌撒禮儀的原則，也加強了教會拉丁化的特徵。而在1659年9月1日，教廷指示在中國的傳教士：「人們在彌撒中間可用本國語言，但不是神父或執事唸的……」，也就是對於神職人員而言，是不被允許用本民族語言舉行彌撒。教宗深願整個教會從

語言（拉丁語）到彌撒禮儀，從彌撒禮儀到信仰達致深度的合一。¹⁷這個傳統經不斷加強，逐步形成了一種不變的信念和教會共同的精神，對後來教友們的信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其實，早在耶穌會傳教士初到中國傳福音時，羅馬聖座就已知悉拉丁文對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的困難，也曾給予中國教會特權，允許中國神職人員可以用中文做彌撒，只不過由於諸多原因未能付諸實行，殊為遺憾。

這是因為，早在1615年耶穌會士金尼閣（Niccolo Trigault, S.J., 1577-1628）受中華耶穌會負責人龍華民（Niccola Longobardo, S.J., 1559-1654）派遣返回歐洲謁見教宗保祿五世，申請擬用中文舉行彌撒的許可。在著名神學家聖博敏樞機（Roberto Bellarmine, S.J., 1542-1621）的鼎力支持下，教宗保祿五世批准中國教會可以用中文舉行彌撒，同時也允許本地神職人員可以用中文唸日課及舉行其他聖事禮儀。¹⁸

17 其實，當時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主張編纂統一的彌撒經典，但德國和法國卻執意要編纂自己本國的彌撒經典，鑑於宗教改革致使大一統的教會嚴重分裂，而教宗比約五世堅持編纂統一的彌撒經書，以維護教會在語言、禮儀、組織、信仰上的深度統一。參見鄒保祿編著，《從歷史觀點看彌撒禮儀的演變》（台南：聞道出版社，1984），頁49、51。

18 龍華民派金尼閣去羅馬為申請豁免將來中國神父可以用中文做彌撒。因為他們在培育中國司鐸時，遇到很大難題，由於語言系統的差異，中國人學習拉丁語困難重重。當時國籍司鐸候選人的年齡多為三十多近四十歲，甚至更大。譬如知名耶穌會士吳漁山晉鐸時已五十多歲。他們在學習拉丁語時遇到了幾乎是難以克服的困難。因此，在華傳教士希望仿效希臘及斯拉夫教會所作的適應，尋求以中國文字舉行彌撒禮儀的可能。參閱羅國輝著，崔鳳玲撮譯，《利類思《彌撒經典》翻譯始末》，《神學論集》，120期（台灣光啟出版社，1999），頁255-256；方豪，《吳歷》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香港公教出版社，1970），頁204。

後因中國禮儀及譯名之爭，致使翻譯《羅馬彌撒經書》的工作延誤。¹⁹遲至1670年，耶穌會士利類思 (Luglio Buglio S.J., 1606-1682) 於一人之力，幾經艱辛的努力，終於把拉丁文《羅馬彌撒經書》譯為中文，獲得中華耶穌會的集體審查通過。²⁰然而，隨著禮儀之爭不斷升級，傳信部於1698年收回了1615年准予中國教會用中文做彌撒的許可。²¹教宗本篤十四世於1742年頒佈了《自從上主聖意》 (*Ex quo singulari*)，禁止傳教士們再討論中國禮儀問題，自此，使用民族語言舉行彌撒的可能性，直至梵二推動教會本地化的語境中始得以實現。²²

然而，時過境遷，當歷史的巨輪駛向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教友雖然不懂拉丁文彌撒的經意，但已習慣了拉丁文彌撒的禮儀，且久而久之對拉丁彌撒擁有了深厚的感情，加之，教友對那段被禁止的中文彌撒經書的歷史毫無所知，以至於教會當局允許用中文舉行彌撒時，反而流露一臉的茫然和強烈排斥的心態。此情此景，真令人唏噓不已！

19 鄭安德，〈『徒斯』的中國名稱：明末基督教神名之爭〉，載程恭讓主編，《天問》，丙戌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4-46；段春生，〈高一志的辯護：Deus漢譯之爭新考〉，《輔仁宗教研究》，35期（台灣：輔仁大學宗教學系，2018），頁35-60。

20 利類思譯，《彌撒經典》 (*Missale Romanum*)，見鐘鳴旦、杜鼎克等編，《徐家匯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15冊（台北：利氏學社，2013），頁1-718。

21 參見雷立伯，《近代教會史》，頁99。

22 1614金尼閣受龍華民派遣抵達羅馬謁見教宗保祿五世，請求豁免在中國翻譯彌撒經書，為培養中國神職人員。1615年1月15日，聖部會議特准耶穌會士在中國以高雅的中文翻譯聖經、舉行彌撒、日課祈禱，並可在禮儀中戴冠（祭巾）。同年3月26日，由聖博敏主持聖部會議決定：(1)所有在華傳教士可在禮儀中戴冠（祭巾）；(2)准許在華傳教士以中文舉行彌撒、日課、所有聖事及聖儀，惟須符合羅馬禮規，並須得主教同意。同年6月27日，教宗保祿五世以最高權力頒令以上特准。後由於禮儀之爭，申請出版《彌撒經書》之事擱淺。1752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長 Z. Burgerieu 與雲南宗座代牧 J. E. de Maritlat 再次向教宗申請施行1615年的特准，再被拒絕。1789年傳信部秘書長代表中國主教再次向審查員委會申請准許以中文舉行彌撒，結果仍不獲准，直至梵二。參閱羅國輝著，〈利類思《彌撒經典》翻譯始末〉，頁255-264。

三、教會聖樂本地化的探索

1. 教會聖樂在山西掠影

山西天主教在教會音樂方面具有悠久的傳統和鮮明的特點。早在明清之際，傳教士即將歐洲教會音樂與本地民間音樂結合，形成了天主教本土音樂文化語言。²³

早在1636年寄往耶穌會總會的年報中，傳教士們已記載了山西天主教發源地段家莊教會奉獻教堂慶典的動人一幕。明末第一代天主教徒段袞，字九章，聖名伯多祿，曾為家鄉段家莊建教堂一座，教堂竣工後，邀請高一志神父主持奉獻教堂彌撒，「段伯多祿請神父用一天時間，來他們村裡（段家莊），為所有教友做彌撒，在教堂裡，許多小朋友用中文唱著聖歌，神父畫十字聖號，並且做了許多的祈禱。」²⁴

文獻中特別提到了有許多「兒童們唱著中文聖歌，神父畫聖號，做了很多的祈禱。」

這是目前關於山西教會最早記述教會聖樂的史料。明末的中國，正值歐洲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後全面推行教會復興時期，在以拉丁禮儀為主流的時代，可以聽到兒童唱中文聖歌，足以顯示出以高一志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們，在將教會聖樂禮儀本地化方面做出的努力，體現了教會音樂與本地音樂相遇、對話與融合的過程。

²³ 孫晨會，《天音北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頁2。

²⁴ António de Gouvea, *Cartas anuas da China*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8), pp. 88-90；見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二編》，上冊（澳門：澳門大學出版社，2014），頁251。

明宗室後裔靈丘王府管理朱鼎鐔在岳父段袞的影響下皈依了聖教，將王府的音樂演奏融合了西方教會的音樂特點，發展出山西絳州教會的音樂特點，傳承至今。耶穌會傳教士這一前瞻性的教會聖樂本地化努力，比梵二大公會議推動教會音樂禮儀本地化整整提前了300多年。

自1723年雍正全面禁教至兩次鴉片戰爭，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教難時期，教會一直處於地下活動的狀態，聖樂方面難有發展。1911年至1949年間，由於政治氛圍寬鬆，教會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尤其自1923年後，在首任宗座代牧剛恆毅總主教（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 1876-1958）的英明指導下，中國天主教迎來了歷史上第二個黃金時期，教會在牧靈事業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從1890年教友僅有60萬教友，至1949年已發展至330萬教友。²⁵

在此歷史背景下，教會在民樂和聖樂方面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仍以傳統的拉丁聖樂為主。與其說民樂作為輔助性的禮儀在彌撒禮儀中獲得局部的呈現，更好說是在基督徒婚喪禮儀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太原教區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這不僅由於太原教區地處省府所在地，更因耶穌會與方濟會傳教士在此地留下相當深的影響力。太原教區具有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其現有的音樂形式有幸保留著不同時期異質文化結合的痕跡，即將民族音樂的特

25 沙百里著，耿昇、鄭德弟原譯，古偉贏、潘玉玲增訂，《中國基督徒史》，頁326-327；畢爾麥爾，《近代教會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頁329；莫菲特，《亞洲基督教史》，卷二（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暨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0），頁226；曾麗達，《雷鳴遠神父——中國教會本地化的前驅，劃時代的福傳方法》（台灣：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2004），頁23-24。

點與基督宗教音樂的特點融合在一起，呈現出拉丁禮儀與山西傳統民間音樂的融合。教會禮儀與本地民間音樂多方位結合的嘗試和努力，應該歸功於傳教士與本土基督徒共同的努力。²⁶

《梵二禮儀憲章》對禮儀改革提供了決策性的思想指導，延續了千年的拉丁文禮儀和額我略聖詠被允許翻譯為世界各國的民族語言，極大地改變了天主教禮儀和音樂的未來命運。

有關於此，梵二《禮儀憲章》第六章如此說道：「在若干地區，尤其在傳教區，某些民族有其固有的音樂傳統，在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就要予以應有的尊重及適當的地位，一則為培養宗教意識，一則為[……]使敬禮適應其民族性。」

2. 山西教會音樂家——耿輝

為回應梵二在聖樂禮儀方面的教導，以太原為代表的山西天主教在聖樂本地化的過程中做了許多可貴的探索，其中以太原教區耿輝老師為代表，在聖樂本地化的探索中具有典範意義，對山西教會聖樂禮儀的發展有其重要的影響。

耿輝老師（1941-2011），聖名安多尼，山西師範學院音樂系教授，曾任太原總堂天音合唱團藝術總監、總指揮，天音合唱團主要創建人之一，是一位集聲樂、作曲、指揮三項學有專長於一身的優秀的教會音樂家。他把自己平生所學和畢生的才華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教會，堪稱山西天主教聖樂的領軍人物。

耿老師出生於虔誠的教友世家，兒童時就參加了教會的輔祭班和唱經班，自幼就立志要為教會聖樂事業而奮鬥。1962

²⁶ 孫晨蒼，《天音北韻》，頁21。

年，他畢業於瀋陽音樂學院，並留校任教，期間曾創作了許多音樂作品。1984年調回山西後，在山西師範院校從事音樂教研工作。1985年始，耿輝一直受聘於山西孟高維諾修院講授音樂課，培育修生視唱、彈琴、指揮、作曲，期間開始了中文彌撒經曲的創作。

1986年聖誕節，耿輝的首部中文彌撒曲：《獻禮彌撒》問世，該彌撒經曲以其開放、歡快的節奏，振奮與激昂人心的宗教情感為特徵，深受神長和教友們的喜愛，於短期內迅速傳遍三晉教會，並在全國各地教會傳唱不絕。接著，1993年耿老師完成了《聖三彌撒》曲的創作。同年，他又譯配了中文版的四聲部《古諾彌撒》。²⁷

在梵二禮儀本地化的精神鼓舞下，1995年耿老師努力挖掘民族藝術精華，將之與教會傳統額我略彌撒相結合，創作了具有民族音樂特點的大型《中華合一彌撒》，該經曲大量運用了民族五聲調式：宮、商、角、徵、羽的特點，極大地豐富了傳統彌撒歌曲的藝術表現力，呈現了民族特色與基督宗教聖樂的完美結合，回應了梵二對教會音樂本地化的教導，在國內外華人教會中得到了強烈的共鳴與廣泛的傳唱。

2006年，耿輝推出了關愛教會少年兒童信仰的《中華童聲彌撒》。在之後的幾年裡，他又陸續創作了《讚主頌》、《聖母頌》、《修院之歌》、《阪泉山聖母歌》、《七苦山聖母歌》、《和平工具》等20多首膾炙人口的聖樂歌曲。²⁸其中，

²⁷ 古諾 (Charles-François Gounod, 1818-1893) 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法國著名作曲家，除了代表作《浮士德》，他還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宗教歌曲，如《聖母頌》、《聖塞西勒慶典彌撒曲》、梵蒂岡國歌《教宗進行曲》等。參<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夏尔-古诺> (2018年5月15日)。

²⁸ 耿輝，《中文彌撒作品集》(山西：太原教區，2014)，頁1-2。

以聖母瑪利亞作為歌頌和讚美的主題的聖歌，廣為教友們喜聞樂唱。

耿輝老師創作的聖樂，在音樂內容上延續了教會傳統的神學思想和禮儀形式。他的幾部大型彌撒經曲：《獻禮彌撒》、《聖三彌撒》、「中華合一彌撒」等，均以極富表現力的音樂語言，極大程度上拓寬了教會傳統彌撒禮儀中的「垂憐曲」、「光榮頌」、「信經」、「歡呼讚」、「聖聖聖」等經曲的藝術表現力。

在聖歌的創作方面，耿輝對教友們在彌撒禮儀和祈禱時所唱的聖歌賦予了許多新的音樂表現形式，在原有歌詞的基礎上譜寫新的曲調。此外，他也和教會其他人士合作，由他負責譜曲，他人作詞，這樣的合作相當成功，在樂譜與歌詞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的銜接與對應上可謂天衣無縫、珠璧聯合，從整體上開拓和創新了聖樂語言的表現形式。

耿老師為教會創作的一系列既富有教會的傳統精神，又具有時代的民族氣息的聖歌，以嶄新的形式極大地拓寬了教會聖樂本地化的發展空間，體現了山西教會在梵二聖樂本土化的努力和實踐。當談及聖樂的創作經驗時，他感慨地說道：教會聖樂「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耿老師創作的膾炙人口的彌撒經曲正是充份地體現了這一特點，給教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結語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對禮儀曾做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要了解教會禮儀的精神，就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本質，基督信仰的真理包含：福音的信德，教會的祈禱及福傳的使命。在

具體的禮儀行動中，信理、祈禱、使命，三者彼此光照，彼此聯繫。因此，禮儀堪為產生與基督結合的基督徒生活的泉源和力量。²⁹

禮儀既在基督生活中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且對教會生活影響鉅大，對教會禮儀影響鉅大的，莫過於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法令。特倫多禮儀朝拜具體表現為，司祭與信友們「在祈禱時朝著同一個方向：朝向東方，作為主將來臨的宇宙象徵；在不可能的情況之下，便朝向教堂拱壁上的基督畫像，或朝向十字架，又或單單朝向天空，正如主在受難前夕，在祂的司祭祈禱中所做的一樣。」³⁰

特倫多大公會議關於禮儀教導所形成的傳統，對後來三百多年的中國教會的信仰生活影響至深且鉅。

以山西天主教為例，太原教區和長治教區是山西教友最集中的地方教會，教友多聚居在教友村，如六合村、洞爾溝、沙溝、紅溝、圪塨溝等教友社區；基督徒雖然在外表看起來與教外人沒有兩樣，但根植於其生命中的基督信仰及其信仰的表達，卻使得他們被視為社會的另類，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教難期間，為了維護信仰的完整和純潔，教友們遠離繁華的社區，寧願生活於偏遠之地，也不願意與世俗妥協。因而，他們的信仰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又具有封閉性的特徵。走筆至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何以在梵二閉幕三十多年後，中國教會在實施禮儀改革時依然遭到了一些教友們的強烈的反對。

²⁹ 拉辛格，《禮儀之精神》（河北：信德室，1991），頁162-163。

³⁰ 拉辛格，《教宗本篤十六世禮儀訓導彙編》，頁20。

在梵二精神的光照和鼓舞下，開放後的內陸山西教會在關乎教會聖樂的發展方面，既紮根於教會的聖樂傳統，又重視汲取民族聖樂的資源，兼顧傳統和現代，推動教會聖樂與民族音樂的對話與交流，並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了為數不少的具有本地教會特色的聖歌。這些聖歌在內容取向上堅持以聖經和教會的傳統信仰作為主要資源，同時也呈現了當下教會發展的新氣象。這些用作聖樂的歌詞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教會本地化的特點。

綜上所述，如果說耿輝老師在教會聖樂的理論和作曲方面對梵二後教會本地化的實踐做出了可貴的努力，那麼太原教區的張光堯老師，則在推動教會管樂方面不遺餘力，他幾十年如一日將教會音樂的本地化探索，具體落實在管樂培育方面。張老師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去輔導各教區的民樂和管樂，進行了持續而系統的訓練，極大地提高了教會聖樂的藝術表現力，給教會信仰生活帶來了振奮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此外，2017年，山西榆次教區幾位年輕神父也嘗試舉辦山西教會聖樂的研討會，並出版了簡單的冊子：《山西教會民樂文化交流研討會資料彙編》，藉以希望能夠搶救已經消失，或即將消失的民樂中的工尺譜，為教會保存本土音樂的寶貴資料。凡此種種，均可看出山西教會在禮儀改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